

我的228事件

文・圖／蘇仲卿

1947年，我19歲，大一學生，在民報社兼差當校對員。1976年，我在美國加州大學Davis校區，讀到George H. Kerr所著的“Formosa Betrayed”，深受衝擊。2007年，我在臺北高等學校的同班同學寄來日文譯本，讓我再次憶起那一年。雖然記憶斷片，並且時空可能倒置，還是有必要記錄下來作為我自己對將暮一生的交代。

進入民報社打工

二戰末期，受到統制經濟的影響，靠自由市場機制才能運作的家業沒落，加之家父生病住院，戰後，為要繼續學業必要自食其力。此時，給我很大鼓勵與協助的是擔任臺北高等學校學寮（學生宿舍）寮監的德文教授瀧澤壽一（Takizawa Jyuiti）老師。1945年3月，進入理科乙類唸書，不久即被徵入日本陸軍當起「學徒

兵」，因為我個兒大，被併入與臺北商專合編的重機槍隊指揮班，成為同班隊員瀧澤老師的「戰友」。在約半年的軍旅生活中，瀧澤老師在品德惡劣指揮官之下的許多愛護學生行為，給旁觀的我很大的感動。

戰後，他瞭解我的困境之後，替我尋求生活與求學兩立之道。開始時，給我安排不影響上課的零工，受益的不止我一個，後來靠他對臺高校友的影響力，在開業不久的民報社，得到校對員的工作。

校對是新聞稿經排版後才開始的熬夜工作，主筆寫的社論、或是主要收入來源的廣告，不是不成熟的學生打工可以碰的項目。剛開始我的主要工作是外勤記者在趕截稿前送進來的新聞稿，所以與「校了」（清稿）的時段都較晚，到社時間在下午7到8點之間，等到全版的校了交給印刷部門是清晨1、2點了。因校件來回有些空檔，並且是有校件送來才做的包工制，假如知覺的轉換迅速，也可以在工作時間內唸書而不會被說偷懶，對白天當學生的我，可以說是很適宜的兼差。

民報社與我的大一生活

我進入民報社是在1946年的舊曆新年過後不久。頭一次上班時，編輯部設在萬華火車站附近一棟普通住家2樓，到秋天我上臺大時，全社已經搬到中山北路上、馬偕醫院的北邊一棟木造大平房。由於報社的作業幾乎是24小時不中斷，所以設有值夜室及淋浴間，讓我收工後可以過夜。起早後，和已經上班配報的營業員打聲招呼，然後騎著腳踏車到臺大上課。當時的大學生都是公費生，將受配的米及公費的一部分交給學校，就可



早年與研究室學生及大學部專攻生於校園合影。年輕時的宋賢一教授也在內。頭部的位最高的一位是郝龍斌市長的夫人高閻仙。

以在學校福利社（現在的第一會議室）吃三餐，對我來說，早上騎單車上學是很好的餐前運動，只是遇到下雨天就很辛苦。不過，為了三餐，不論有沒有課都要到校。還好農化系有高校前輩當教授，提供研究室做為我們的落腳點，不但可以休息，也有一大櫃的日、英、德文化學書籍，讓我豐富了知識。實際上，我在大一時上的課非常少，理由是日治時代的大學部3年制，戰後改成4年制的大一課程，都是高校所修範圍。

當時國語剛由日語改為北京官話，英語教育在戰時被輕視，語言課當然是必要緊急補強的。但是，聽不懂大一國文課老師的國語，英文課的老師程度低，且考試都是紙上作答，可輕易過關。因此對我來說，報社的校對工作是絕對不可馬虎的報章式「時文」（日人漢文課本中稱白話文為時文）用法的訓練；插在校對工作之間的英文刊物閱讀，以及在前輩研究室的書籍「亂讀」，都有相當的學養提升效益。也因為如此，我對民報社有深厚感情。

民報的版頭報名題字，我記得由國父孫文具名。我不知道其源由，卻給剛唸完國父「三民主義講義」的我一種歷史使命感。社長是臺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，編輯長、也是我的頂頭上司是高校理甲同屆許乃超同學的長兄許乃昌先生，總務（兼發行人）及經營分別由吳春霖及林佛樹2位先生主管，採訪主任駱水源先生是我入社的直接介紹人。以上，60年後還可以不用查資料寫出大名的人物，都是日治時代的本地漢文報老報人，難怪Kerr的書中說，《民報》是當時臺灣最有力民間報紙。

在民報社看228 事件

1.目擊227 現場

2月27日傍晚，因是月底發薪在即，在回臺

大校區前，就打算到圓環打牙祭，不取直達路線的中山北路而繞道延平北路，由天水路往圓環跑。一進入天水路就發現路上有異；因為附近有三三五五的民眾在議論，並且依照現場民眾言論的指引，看到一台中型卡車，四輪朝天，顯然被燒過。在圓環的攤子，一邊吃一邊問，知道了所發生事情的大概，急遽趕到報社向採訪記者報告，於是當天晚上的校對工作上，讀了記者所寫事件內容。由公賣警察取締私菸而發生的這一起傷殺事件，現在有許多口述報導，亦見於官方調查報告書，不必由事件後只看到被燒卡車的我抄寫別人的報告。

在圓環吃飯時，由周圍群眾的許多發言，大約可以歸納以下幾點民情：沒有菸酒公賣制度的大陸，有許多在上海製造的捲菸運到臺灣賣，並不受「私菸」取締；用臺灣產菸葉製造的「豐原菸」，卻因政府繼承日人留下的「專賣」制度而不得上市，非常不公。戰後雖然肥料缺乏，但是，以臺灣戰前一年收成可養全民兩年以上的米糧生產力，以及規劃長期戰爭的日人，備儲甚多軍糧（挖山洞做倉庫，動用民夫運米運糖堆積，都不是秘密）的事實來說，光復只有一年半，臺灣的最大農產品米與糖都發生缺乏而價格飛揚，其理由一定是貪污的後果。當時接收大員貪污行為比比皆是，並且不怕民眾的視線，將民生必需品的缺乏及生活的困苦歸結為貪污是很自然的社會意識。大戰期間，雖然在糧食配給的統治經濟環境下，民眾並不是沒有過不滿心緒，但是治安良好，又沒有過餓肚子經驗，卻在以歡喜的心情迎接的光復之後，立刻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而賺的錢遠不夠買米的情況，難免有懷念日人法治的聲音不斷於耳。總而言之，在此一發端於取締私菸的傷殺事件之後，我強烈地感受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，並且有了模糊的不安感覺，但是，因為

環境的變遷太過於迅速，連山雨欲來的預感都沒有。

2.228 當日

2月28日清早，騎腳踏車沿中山北路往臺大的路上，到達行政長官公署（沿用日治時代的臺北市政府廳舍）時，已有民眾往公署前的廣場開始蜷集。仰頭看到陽台上的衛兵腰間帶槍、槍口朝下。到南門公賣局，看到有一大堆椅桌之類，被堆積在南門與公賣局大門之間的路上燃燒；由南昌街進入兩邊還是水稻田地的古亭一帶時，開始自後頭的市中心區傳來斷斷續續的槍聲，知道昨天晚上的事件，已經惡化到軍警大規模向民眾開槍的緊急事態。

學校內人影稀少，顯然教務的運作也停下了。當作食堂的福利社有幾十個學生用餐之後在開會。我到達時傳自城裡的槍聲讓氣氛更加緊張，有關事態情報也少，所以學生常有的長辯議論不見了，很快得到回鄉瞭解情形，見機行動的結論，而我則決定回報社。考慮長官公署前的人潮及其後發生的槍聲，改取道延平北路經雙連回報社。經過1945年5月30日的臺北市大轟炸被炸成瓦礫的鐵路飯店廢墟左轉，面對北門走出不久就發現不能再前進，因為郵政本局與北門之間的馬路上有2個人臥倒在地，還有斷斷續續的槍聲發自郵政本局對面的鐵路局大樓。於是迴轉走到中山北路，由日人叫做「梅屋敷」的日式旅館（後來被指定為國父來臺時住過的紀念館）旁邊走進建成街市政府前（因臺灣總督府被美軍轟炸損壞，臺北市政府讓出日治時代市政府廳舍給長官公署，建成國校校舍被市政府使用），經過圓環、雙連而回到報社。路上看到有幾位衣著像外省男子，被毆打躺在路邊，奄奄一息；附近還有不少年輕力壯的傢伙，殺氣騰騰。後來聽說是以

日語及臺語詰問為辨別辦法，被認為有問題就挨打，是故，本省人因心慌不能即時回答而被誤打者亦有。

至於臺北以外的地方情況如何？因為島內民間通信網路已幾全癱瘓，要即時獲得正確消息是至難之事。有一些地方廣播電台被民眾占據，可以聽到混合臺日語的激昂聲音，其內容不足於構成有系統通信。報社雖然可用電話聯絡各地，但是新聞配送體系的麻痺已經呈現。

這一日臺北全城雖然混亂，因為槍聲時有所聞，在街上流動的人不多，連新聞記者的採訪亦受限制，由以上幾種因素，要維持正常報紙版面有困難。報紙版面縮小是非常不得已的措施，而版面的縮小讓編輯及印刷的工作量減少，這一情況繼續到3月8日最後一刊的出版。

3.301 到308

228 的激情很快被理性取代。3月1日以住居於臺北市的市政及省政參議員參與為主的民間「處理與協調委員會」成立，在公會堂（臺北市中山堂）集會，向政府提出取消228發布的戒嚴令、政治改革及補償受難者的陳情。初期市內還有一些軍警與民眾的摩擦事件所聞，政府派出代表與委員會周旋，大致上表示同意解除戒嚴令、對犧牲者的補償及接受改革建議，陳儀也發布安撫文告，於是市內大致回復平靜。因為學校等於停課，白天無事，我幾乎每天都到公會堂看貼在外的告示，晚上則由記者的文稿獲得進一步消息，以為有政經環境改進的希望在前。

4.309

這一企盼卻被3月8日深夜的激烈槍聲打碎無餘。當天晚上因為是縮小版的編輯與印刷，最後清稿的工作落在我與另一位打工的化工系同學陳朝明君（他也是高校的同屆同學）的頭上，另有2

名印刷工及一名排版工，共5個人在報社內。記得是午夜過後不久，剛要開動平版印刷機時，忽然在中山北路上有一排一排的輕機槍發射聲大作，又有步槍聲間歇加入。我請大家趕快關燈並停止印刷機器。從面臨中山北路的玻璃窗往外看，看到有一挺輕機槍向對面的巷道發射吐出的火舌。於是，我建議大家都到離馬路較遠的印刷廠區域，又因為房子是只有約1公尺高磚牆的木造房屋，就躺在地板上以免被流彈打到。

那一晚，槍聲忽近忽遠起落不斷，印象很深的是來自圓山方向的步槍聲相當密，可能與後來聽到的有許多以鐵絲反綁雙手被槍殺的屍體，漂流到淡水的事有關。破曉時槍聲已停，等到曙光微露，擔心報社成為攻擊目標，於是離開報社，到距離建成圓環不遠的高校理乙同班同學黃際鍊的家（大農經系畢業，任教於母系，現為名譽教授）。在往圓環的路上，遇到突襲，我們立刻閃進亭子腳柱後方，這是此生唯一被實彈槍支瞄準射擊的經驗。

5.309 之後

我們在黃同學家避難約有5天。在槍聲不斷之下，不會有市，米箱很快見底是當然。在此困境之下，黃同學一家接受兩難民，分享難得的米糧，是我畢生難忘的溫情。第五天，槍聲停了，看見也有人開始在街上走動，於是告別黃家，走路回新莊。回到家時，因已有兩星期音訊斷絕，看到家人露出的笑容，真是有隔世重逢之喜悅。

後記

1.民報的廢刊

事件平靜下來之後，我到了報社，被告之報社關門，並發了一份遣散費給我。我們開始印刷但未能發出的1947年3月9日號，這是民報的最

後一版，我們幾個低級社員成為它臨終的見證人。社內的印刷房，有許多鉛字散亂在地板上，三夾板上印有不少槍把的痕跡，顯示軍兵進來破壞過。民報社長林茂生博士遇難於這一大變故，惟政府從未證實，而有接管的醫學院病理科葉曙教授在回憶錄中寫下「糊里糊塗失蹤」之語。除了林茂生先生外，還有農化系學弟林朝彥同學的父親，獸醫系好友潘英章同學的父親等人。

2.吳克泰先生

講到民報社，不能不提吳克泰先生。他是臺高文科甲類，高我兩屆的前輩。在臺北二中時與家兄同屆，所以我知道他的原名是詹世平。記得是報社搬到中山北路之後，他以詹致遠名字來民報社當校對打工，說是剛由大陸的震旦大學轉入臺大。

228 之後，隨著報紙版面縮小而工作量減少，在報社看到詹前輩的機會也減少。很意外，離開避難5天的黃同學家，在迪化街的巷內碰到他，雙方都大吃一驚。他問我近況後，還仔細告訴我，安全通過臺北橋的方法。依照他的指示我



10多年前攝於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。

得以安全回到家。沒有想到，那次一別要等到1995年才在北京再會。

1988年我以中央研究院代表團團長身分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國際科學聯合會（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, ICSU）會員大會，主辦單位是中國科技協會（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CAST）。一到北京就請CAST的接待人員找詹世平或詹致遠先生，到會期將屆還沒有消息，以為絕望，想不到在最後時刻捎來消息。他們說他改名為吳克泰，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常務委員，還抄了他家的電話給我；我打了電話去，不巧，他公出。直到7年後太平洋科學會（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, PSA）在北京召開會議時，才見到面。

1997年他與夫人一起回臺觀光，2003年春天他隻身來臺作228事件的見證人，兩次回臺時都有相聚。2003年是他最後一次回來，在談話中他提到，身體不很硬朗，希望在臺期間作一次健檢。我們都說請臺高同學會長、前臺大醫學院長黃伯超來安排最適當。沒想到，體檢住院變成急性肺炎住院，他的女公子由美國來臺護送他回北京養病。聽說在北京的醫院有一次病情惡化到無望，後來奇蹟式恢復出院，以將近2年時間從事口述歷史的撰寫，2005年過世於北京。

結語

228事件將臺灣住民以1945年為移住時間的界線切成兩個大族群。在228與白色恐怖的年代，當一個本地出生的大學生而中國語言的使用都不自在的年代，若說沒有受到歧視是假的。我有不少很照顧我而畢生難忘的日本恩師，但是也遇過不少歧視臺灣人的日本人。我厭惡而絕對反對分割族群觀念，然令人遺憾的是，現在的臺灣為政治權力的爭奪，經常將分割兩大族群的過去事件從墳墓叫醒，還將族群的分割更仔細化使其與文化的多元性混淆。

日本統治臺灣時，民族歧視的仇痕以及威權政治年代的族群權力不平衡的傷痛，應該是歷史的教訓而不要作為政爭工具。我講的、寫的、讀的最應手的語言是日文，因為它是我從小學時代開始以國語的立場學習14年的語言。我有不少日本同學朋友，還有超過90歲的日本老師與我來往。我家有架設天線專收日本的衛星廣播。那，我對日本民眾的族群認同強於臺灣民眾嗎？我的回答是絕不。我認同的臺灣民眾是一個全民而不是被分割的幾個族群中的一個。我欣賞日本的文化，但是我認同的是讓我生活的臺灣。活在臺灣的每一個人民都是臺灣人，我認同的共同生命體由所有的臺灣人組成。■（原稿完成於2007年）

蘇仲卿小檔案

臺大農化系學士（1950）、碩士（1954），美國Berkeley加州大學生化博士（1960）。曾任臺大農化系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（1950~1999）；中研院（合聘）副研究員、研究員、生化組長（植物所），籌備處主任、所長（動物所），籌備處主任、代所長（生化所）；國科會（借調）國際合作處長；退休後曾任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總主持人（5年）及顧問、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資深顧問、臺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研究中心資深顧問。現任臺大名譽教授、中研院通信研究員。專長植物生化與分子生物學，酵素工程技術。E-mail:jcs@ntu.edu.tw。